

革命在上演——郭沫若与特伦斯·麦克斯威尼

杰鲁莎·麦克考迈克

戴从容 译

1920年8月12日，特伦斯·麦克斯威尼因加入爱尔兰共和军在科克市被英政府军逮捕，科克是当时大英帝国桀骜难驯地区的主要城市。虽然爱尔兰起义早在4年前，在1916年复活节期间就爆发了，但被认为是一次军事上的失败。为了巩固它的反抗效果，爱尔兰共和军与试图维持帝国对爱尔兰岛控制的英国防卫武装展开了激烈的游击战。

麦克斯威尼被捕的那一天，一位叫郭沫若的年轻中国诗人，当时是在日本福山留学的医科学生，正处于创作第一本诗集的阵痛之中。郭沫若出生于1892年清朝末期，此时跟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起，在自我流亡中离开了那个已陷入政治混乱的国家。尽管如此，他是一位满腔热情的民族主义者，憧憬着他预见到的未来的——现代化的——中国。郭沫若是被中国政府与其他人一起送到日本来接受实用技术方面的培训的，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然而他滞留在日本，与人一起创建了后来的创作社，将那些有志于通过新的写作方式创造一个新的国家的年轻人联合到一起。

尚在日本学医的时候，郭沫若就通过做业余记者来磨练他的写作技巧。为了紧跟国际时事，他几乎每天都得光顾电报局。爱尔兰在1916年的流产了的起义之后，像中国一样处于政治动荡之中，并一直得到新闻的高度关注。这样，通过用一系列加急电报报道特伦斯·麦克斯威尼的被捕，郭沫若第一次成了名人。通过这些报道，郭沫若可能也认识到特伦斯·麦克斯威尼在很多方面正走着一条与他平行的道路。像郭沫若一样，他年轻，满怀理想，是一个坚持原则、为自由而战的活动家。与郭沫若不同，他是一个政治家。麦克斯威尼一开始代表科克中部地区当选新的爱尔兰众议院（新建立的爱尔兰议会）议员，然后在科克郡政府任职。1920年3月，在他的前任托马斯·马克·柯廷被英国势力暗杀后，他被任命为科克市市长。

麦克斯威尼与郭沫若共同拥有的是对文字的力量有信心。1918年，被捕前两年，麦克斯威尼出版了薄薄的诗集《战斗呐喊》。不出所料，这并非是哀悼那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死者，而是召唤勇士们做好准备为爱尔兰献身。因为，跟郭沫若一样，麦

克斯威尼无疑相信写作应该成为一种宣传。为了给他那些激情勃发的宣告创造走向公众的平台，麦克斯威尼创办了一份报纸：《斗士爱尔兰》，隶属于《命运勇士》（爱尔兰语 Fianna Fáil）。报纸刚出版 11 期就在 1914 年 12 月因激进的共和立场和反英内容被取缔了，不过这些社论在麦克斯威尼死后一年以《自由法则》（1921）为题出版。

麦克斯威尼和郭沫若都明白，独立并不只是政权的改变，也意味着民众想象他们国家的方式发生了转变。麦克斯威尼认为，威廉·巴特勒·叶芝也认为，文学可以成为改变爱尔兰民众的心灵和思想的工具。两人也都相信，要帮助正崛起的国家想象自身的未来，大众戏剧很可能被证明是最有效的工具。为了这个目标，叶芝与志同道合者在 1904 年成立了民族剧院阿贝剧院。麦克斯威尼追随他的步伐，四年后成立了科克剧社，为此写了 5 部戏剧。最后一部（名为《革命者》，创作于他被捕三年前）将为麦克斯威尼自己提供他作为爱尔兰殉道者的最后公开表演的剧本。

在郭沫若这里，他也从流亡开始，通过诗歌把自己在公众眼里戏剧化为一位浪漫的革命者。跟很多在日本的中国同龄人一样，郭沫若试图通过翻译西方的主要作品，把一种新的现代性引入中国。在郭沫若看来，这意味着在珀西·比希·雪莱、拜伦爵士，以及（尤其是）瓦尔特·惠特曼的革命诗歌中找到诗学的——也是政治的——榜样。特伦斯·麦克斯威尼被捕那天，早已沉浸在浪漫的殉道者叙述之中的郭沫若，在诗歌中也准备好了拥抱那正蜷伏着等待麦克斯威尼的命运。

跟麦克斯威尼一样，郭沫若逐渐明白，在这里，得到的不是战场上英雄的流血牺牲，而是一场征服他们国人的心灵和思想的战役。让人吃惊的是，虽然麦克斯威尼是热切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却并不相信武力的作用。就像他逐渐明白的，更有效的是一种灵魂柔道，通过这一柔道，反对力量被用来反对它自身。麦克斯威尼相信，英国占领武装，及其背后的当权者这些政治敌人，依然相信公平游戏和荣誉等纯质英国价值。他也承认爱尔兰人在人数和装备上都相差甚远，令人绝望，就像与英帝国武装的所有斗争中一直呈现的那样。因此真正的战役，他认为，运用的不是物质的力量，而是心灵的力量。在被捕的那一年，麦克斯威尼在他的科克市长就职演讲中阐述了这一信念，所用的词句，事实上，将成为他的墓志铭：“在我们这边，我们的斗争不是报复性的对抗，而是忍耐力的对抗。赢得胜利的将不是那些最能出击的人，而是那些最能受苦的人……”。

麦克斯威尼抗议被捕的方式并不新鲜；在他之前也有人死于绝食抗议（甚至不久之前）。但是他的受难——由于发生的时间、长度，以及彻底示之于众这一点——将成为榜样，彻底改变后来许多自由战士的思考方式，比如圣雄甘地和纳尔逊·曼德拉。麦克斯威尼现在要将他的原则付诸现实了。被捕并转押伦敦布里克斯顿监狱六天后，在 1920 年 8 月 16 日，特伦斯·麦克斯威尼开始了绝食抗议。他将在接下来的 74 天里慢慢地、痛苦地，以及在国内和国际媒体的密切关注下高度公开地死去。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日本，随着那些无情记录麦克斯威尼身体恶化的电报报道发过来，郭沫若在阅读的同时，开始把这些断片组成一首诗。这首诗不仅是一条报道，它变成了一个事件：一次能够把它的读者群体转变为新的精神群体的行动。如果这是浪漫的民族主义的精髓，很显然，它也是一次宣传行动。郭沫若后来写道，“文学是革命的先驱”。

不过，当麦克斯威尼去世一年后，最终在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里出版时，这首诗已经不仅仅被理解为革命宣传了，而是表达了一场新的、有力的文化革命，重燃了两年前著名的五四运动这一中国自己的革命时期的热情。今天这首诗可以被当作事实如何成为文学的绝佳案例，——以及文学如何成为事实。恰恰是这一可转化性让麦克斯威尼和郭沫若两人如此异曲同工。在这一背景下，麦克斯威尼的死亡可以被视为付诸行动的诗歌宣传；郭沫若的诗歌则是政治鼓动的行为。

郭沫若的同代人深悉事实革命与文学革命如何常会相互交织，有时变得可以互换。就事实革命来说，爱尔兰长期摆脱大英帝国争取独立的斗争，到 1920 年已经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在 20 世纪初期，《小说月刊》（1910-）、《东方杂志》（1904-1948）和《文学周报》（1921-1929）这样的刊物已经对爱尔兰给予了专门关注。就像陈丽注意到的：

用“爱尔兰”这一关键词来搜索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全文检索数据库，结果显示在该刊物存在的四十多年间刊发了 800 多篇的相关文献……许多文章密切跟踪和分析重要的爱尔兰政治事件，例如章燮臣的《爱尔兰自治法案》（1912 年 9 卷 1 期）、许家庆的《爱尔兰叛乱之真相》（1916 年 13 卷 8 期）、于世秀的《大不列颠与爱尔兰之历史关系及和议之经过》（1922 年 19 卷 4 期）等等。

从下面的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在 1920 年，即郭沫若出版他的诗歌的那一年，《东方杂志》上以“爱尔兰”为关键词的文章达到顶峰，之后陡然直落。¹

换句话说，郭沫若了解他的读者。自 1917 年俄国革命爆发，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潜力之后，爱尔兰就成为了广受欢迎的革命典范。虽然郭沫若要到 1924 年才开始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他应该已经知道马克思视爱尔兰的独立斗争为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国际斗争的一部分。马克思的战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尤其不仅在曼切斯特他父亲的纺织厂里观察了爱尔兰工人们所用的抵抗手段，也从将成为他终身伴侣的爱尔兰女性罗茜·伯恩斯那里，获得了对该处爱尔兰社团的广泛了解。因此在这一特殊时刻，爱尔兰人是革命者的榜样这一想法会生动地浮现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脑海之中，由此了解 1916 年复活节起义的新闻，以及它在爱尔兰独立战争中的余波的迫切愿望，现在由麦克斯威尼那拖延的、又广为人知的死亡代为补偿了。

事实革命通过文学革命在中国出现。那些渴望创造一个现代中国的人明白这无法在中国自身的土壤中实现——而是需要引进。因此就像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认为的那样，变成了“翻译过来的现代性”²。由于对传统的中国文化感到幻灭，郭沫若这样的知识分子，以及鲁迅（1881-1936）和茅盾（1896-1981）这些同代人主张转向西方模式。这意味着将诸如“科学”和“民主”这类核心概念引入中国语汇，以及对基本文献加以直译。这里面就有爱尔兰文学复兴中的作品，这些作品正对应着中国自身寻找可能的政治和文化出路的努力，以便解开中国自身的困境。

一开始，这些文本与其说是因为它们文学价值，不如说是因为政治价值被引入的：作为社会变革的有力武器。叶芝作为民族主义事业的活动家尤其引起了关注。比如就像陈丽注意到的，“1920 年 3 月，《东方杂志》（17 卷 6 期）刊登了署名“雁冰”（即茅盾）的重要评论文章《近代文学的反流——爱尔兰的新文学》，及其翻译的叶芝剧作《沙漏》”。这无疑是叶芝所有作品中最早被译成中文的。³更重要的是同时发表的文章，在文章中茅盾将叶芝作为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三位主要戏剧家之一来介绍（另外两位是格雷戈里夫人和辛格），并对他称为他们的“反流”现象做了概括：“大家（中国人）都问将来如何？都趋向世界化，不限于局部的讨论和表现，他们却偏注意自己历史的民族的特色。所以在近代文学中，爱尔兰文学自成一派。”⁴

尽管郭沫若从未尝试翻译爱尔兰文学作品，却已经在三位浪漫主义革命诗人的基础上完善了他的技巧：珀西·比希·雪莱（他创作了《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把对神的反抗写成戏剧）、拜伦爵士（他献身解放事业，最终死于希腊独立战争）、瓦尔特·惠特曼（全新的和民主的美利坚的诗人）。这些诗人——尤其是惠特曼——表现出火热的革命激情。在文化剧变之际通过翻译把他们纳入中国的社会/政治场景，郭沫若让这一不可避免与世界其他地区相互作用的中国现代性获得了权威性。因此正是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郭沫若将麦克斯威尼与自由战士们归为一类，不仅有爱尔兰的，也有苏格兰和波兰的，表明了全世界“受压迫的弱小国家”团结一致。⁵通过把他们的行为写成激进的诗歌，他们的行动也可以被读作一首关于激进行动的诗。

因此从一开始，郭沫若写就的麦克斯威尼命运之诗，题为《胜利的死》，呈现出中国最早的国际诗歌的特征（见附录）。它也因此顺理成章是兼收并蓄的，甚至是多语混用的，用英语引用了一位苏格兰小诗人（托马斯·坎贝尔），似乎就是强调这一点。从另一个意义说，它也是国际化的，因为郭沫若把他作为新闻人追踪到的麦克斯威尼的电报拼凑成诗。电报急迫不连贯的诗行仿佛用持续的戏剧化叙述重塑了这一死亡。因此在尊称麦克斯威尼为“爱尔兰的志士”和“自由的战士”的同时，每一诗章都标着日期，就像从每日电讯中摘出的那样，增加了悬念。麦克斯威尼是否会停止绝食活下去？英帝国的统治力量是否会干预？或者他们是否会在这一极其公开的戏剧化挑战面前依然毫不让步？

第一章创作于麦克斯威尼被捕后 7 个星期，其中郭沫若描绘了这样一副画面：麦克斯威尼躺在伦敦布里克斯顿监狱“森严阴耸的大厦”奄奄一息，外面“一群不可数尽的儿童正在跪着祈祷呀”。想象他们的祈祷的时候，诗人直接向这群人说话：

可爱的麦克斯威尼呀！

可爱的爱尔兰的儿童呀！

自由之神终会要加护你们，

因为你们能自相加护，

因为你们是自由神的化身故！

下一章的时间是一个多星期后，诗人问到：“你囚在剥里克士通监狱中克还活着在吗？”怀疑最后的时刻已经临近，诗人回忆起早些时候的报道：

十月十七日伦敦发来的电信

说你断食以来已经六十六日了，

然而容态依然良好；

说你十七日的午后还和你的亲人对谈了须臾，

然而你的神采比从前更加光辉；

就在那一天，郭沫若注意到麦克·菲茨杰拉尔德，一位科克市民和新芬党员，在 68 天绝食之后溘然长逝了。忧心麦克斯威尼将随之而去，郭沫若把麦克斯威尼与菲茨杰拉尔德放在一起，喻为因政治抗议绝食而亡的两位中国古代贵族（伯夷和叔齐）——这是诗中唯一与中国之事有直接联系的地方，不管是不是神话。郭沫若感觉悲剧将达到顶点，用“我怕读得今日以后再来的电信了”结束了诗章。接下来的也确实可怕：

十月二十一日伦敦发来的电信又到了！

说是马克司威尼已经昏死了去三回了！

说是他的妹子向他的友人打了个电报：

望可尔克的市民早为她的哥哥祈祷，

祈祷他早一刻死亡，少一刻痛伤！

不忍卒读的伤心人语哟！读了这句话的人有不流眼泪的吗？

诗人对新闻的反应是激烈的，斥责“猛兽一样的杀人政府”由“冷酷如铁的英人们”领导：这样的情绪会引起它的中国读者的共鸣，他们至今依然把英帝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后他们的失败和半殖民境况视为“世纪耻辱”。最后一章创作于 1920 年 10 月 25

日——麦克斯威尼的死亡（年仅 41 岁）消息发布后一天，郭沫若从哀痛转为修辞上的感叹：

悲壮的死哟！金光灿烂的死哟！凯旋同等的死哟！

胜利的死哟！

兼爱无私的死神！我感谢你哟！你把我敬爱无暨的马克司威尼早早救了！

自由的战士，马克司威尼，你表示出我们人类意志的权威如此伟大！

我感谢你呀！赞美你呀！“自由”从此不死了！

一年后以《女神》之名发表的时候，也就是 1921 年，这首诗与其他诗一起，在文学界引起了轰动。此前，中国从未有人读过这样的诗歌。至今未断的中国传统推崇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诗歌。该类诗歌遵循古代汉语的规则，往往风格正式，情感含蓄，大量用典。在构图中，一切都是庄重得体、旁敲侧击地呈现的。突然这里有一首诗在白话文中炸响，不是预期的古汉语，而是直接诉诸读者——不仅直接，而且有强烈的紧迫感。对读者来说，这种强度肯定就像被当面直击。

它塑造的形象同样打破数百年的传统，不是中国漫长历史中的著名诗人，而是取自不同国家的诗人，尤其是英国诗人——特别是伟大的浪漫主义反抗者，雪莱和拜伦。从这些诗人那里，郭沫若引入了包含雄辩语气词的新文学风格，常常被短的呼喊打断——后面跟着感叹号。以前很少有中国人在文学中看到感叹号，更别说感叹语气词了。⁶这一用法直接引自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呼语，标志着与传统风格的一刀两断，结果句子破碎、不讲形式，有大量的感情流露。藉此，标点成分（以及与之相伴的助词）被引入，决定了一种崭新的诗学，古典诗歌僵硬的旧形式坍塌为自由体诗的口语化流淌，尤其借鉴了郭沫若对惠特曼的翻译。

郭沫若最早读到惠特曼是在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事实上，他至少花了一年才认识到，通过惠特曼的诗歌，“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⁷郭沫若关于在这一革命的关键时期，自我与社会如何相互塑造的辩证观念，或许在著名诗人闻一多的评论中得到最好的表述，闻一多说郭沫若在《女神》中表达了五四运动中年轻人的“压不平”——从而重新点燃了即将湮灭的

力量。⁸用闻一多的话说，这一“径直的‘新’的”诗歌是“时代精神的觉悟”，因此也让该诗被讴歌为他那个时代的“激越的精神”所推动的革命行动。⁹正由于这一点，郭沫若的这第一部诗集在事情过去很久之后，依然被评价为包含着“更深刻的社会变革”¹⁰，引领文学青年向政治青年转变：这一从文学民族主义向政治民族主义的转变，可以在爱尔兰的革命事业中找到呼应。

当然，郭沫若早期诗歌中并非所有方面都源自他对外国文学形式的借鉴。或许事实上，郭沫若写特伦斯·麦克斯威尼的这首诗最深远的影响是写作时所用的载体：电报。通过几乎逐字直搬电报报道，郭沫若有意识地成为另一种国际交流的一部分：现代国际媒体这一模式。郭沫若利用了电报传输的即时性，以及我们赋予新闻的紧迫感——将其变成一种新的声音，藉此，现代中国不仅可以向自己表达自己，而且现在向一个正通过这一新的机械媒介成倍扩大的世界来表达自己。

因为正是得益于电报，在麦克斯威尼死后一年多，《女神》出版之际，麦克斯威尼的行为得到了举世关注。就像在郭沫若这里，麦克斯威尼漫长死亡的英雄传说成为了每日电讯的内容。麦克斯威尼的死亡为什么如此引人关注，是如何做到的？首先是因为爱尔兰自身正通过她的作家们获得新的声音，这一点已经得到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承认。而且这一声音，跟郭沫若的一样，充满戏剧性：在文学层面，革命已经在舞台上演。特伦斯·麦克斯威尼成立科克剧社四年前，也是他创作《革命者》（1915）十多年前，叶芝为他的新民族剧院阿贝剧院创作了两部重要的剧作，让他的现实角色有了舞台和剧本。在那里，他的《胡里汉之女凯瑟琳》（1902）将寓言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戏剧，讲述了年轻美丽的爱尔兰如何为了让她和人民摆脱饥荒，将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在爱尔兰，它对公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若干年后叶芝会问，“我的那出戏剧是否让/一些人向英国人开枪？”¹¹与麦克斯威尼之死政治剧在主题上更接近的，是叶芝的戏剧《国王的门槛》（1904），再现了一则古代爱尔兰传说，讲述一位诗人为了谴责他的君主对自己的不公，在国王门前绝食而死，引起轰动。通过这类为阿贝剧院创作的戏剧，作为更大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舞台确确实实地被用于爱尔兰争取自由的更大型的公共表演，就像麦克斯威尼自己的殉难舞台一样。

作为遍及全球、不断扩展的媒体，电报及其在大众传媒里的新渠道迅速催生了读者对这类公众场面的兴趣。爱尔兰依然是一个小国，人口不多。但是到1920年，国际传媒关于麦克斯威尼绝食斗争的每日报道却可以传给数百万爱尔兰人，以及在流散中

分布世界各地的爱尔兰人的后代，从美国到阿根廷到中国本土。此外，作为当时的大英帝国——在 20 世纪 20 年代依然占有世界三分之一的土地——的一员，爱尔兰的新闻也会传递给几乎所有英国领地的目标英语读者群，从印度到非洲或澳大利亚，再到加拿大。这一巨大的读者群，大多数是基督徒，将在麦克斯威尼之死中认出另一个戏剧：拿撒勒的耶稣的公开受难。被读作英雄的殉难之后，这类死亡会被视为一个人为一系列信仰所能付出的最大牺牲——这些信仰本身无比珍贵，没有了它们，生命也就没有了意义。特伦斯·麦克斯威尼活过，死去，一位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罗马天主教虽然现在只被视为基督教的一个特殊教派，它本身依然是一个世界性教会，在全球许多国家拥有大量的会众。它的媒体通过全球网络，曾经而且依然是向受众传递消息的有效方式。在麦克斯威尼事件中，得以传播的是政治事件如何被重演为精神事件——尤其是基督教事件。麦克斯威尼在科克市长就职演说中的话也印证了这一定位，他说“精神的解放……随着十字架上基督滴撒的鲜血降临到我们身上。”¹²

事实上，不久之前的爱尔兰暴动通过 1916 年复活节星期一这一精心策划和执行（事实如此），直接借助了同一模式——就在麦克斯威尼死亡的四年前。为什么是复活节星期一？正如每个爱尔兰人都知道的，复活节后的一天是全国节日——最初由英国制定，至今依然是爱尔兰的一个节日。作为假日，英帝国在爱尔兰的所有主要控制机构都不上班，因此是群众起义的好时机。但更重要的是，它借助了拿撒勒的耶稣的英雄殉难模式，不仅仅是为信仰而牺牲的象征——而且也是胜利的牺牲，根据基督教的信念，拿撒勒的耶稣事实上并没有死，而是死而复活。

不仅起义时间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那些参加被称为复活节起义的人也知道在一定意义上他们必须失败——他们的生命将被献祭——因为他们事实上（正如麦克斯威尼在就职演讲中指出的）无论在人数还是武器装备上都处于劣势。但是特伦斯·麦克斯威尼明白（用他自己的话说），“一次看起来的失败可以是一次真正的胜利。1916 年的起义就是一个好例子……复活节起义是一次胜利。”¹³这个逻辑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关键。只要追随基督教的逻辑，英雄的失败最终变成胜利的凯歌，那么在武力失败的地方，精神的力量将会胜利。

同样的转化也在叶芝伟大的革命诗歌《1916 年复活节》中得到记载。叶芝重述起义过程的时候，用了大众剧场这一比喻，描绘参加起义的人员时好像他们是戏剧中的演员。该诗所记载的正是这些演员如何从“笑料”或者表面上的小丑，从私下调笑的对

象，转化成为爱尔兰独立事业献身的英雄。这一转化的催化剂就是他们被英国当局逮捕后的殉难，在整整 9 天里，15 位入狱的自由战士一个接一个被处决。在这一关键阶段，爱尔兰民众，最初对复活节起义造成的分裂极其不满，或者漠不关心，却被这一公众戏剧性事件吸引了，尤其因为所涉及的不是职业军人，而是一些作家，他们是落入大英帝国的残暴机器里的理想主义者和追梦人。诗歌的最后一句在记录这一戏剧性转变的同时，依然回响着它的墓志铭：“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

从恐怖中诞生的美也可以用来描绘世界对特伦斯·麦克斯威尼之死的反应，这一死亡极度痛苦却又极为公开。感受到公众的反应，叶芝率先于麦克斯威尼死前两天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了诗歌《1916 年复活节》——尽管该诗实际创作于近 4 年前，在 1916 年复活节事件刚结束之后。这是算好了的，时间恰到好处。叶芝的下一决定同样如此，麦克斯威尼辞世才 4 个月，就在阿贝剧院上演了他的戏剧《革命者》。创作于民族剧院的财务陷入低谷之际，这一公众宣传策略大获成功，财务几个月来第一次得以恢复，甚至更好。¹⁴就像要印证这一剧院隐喻，在麦克斯威尼辞世快一年之际，叶芝重写了他的早期戏剧《国王的门槛》，加上一个新的更悲剧性的结尾，绝食的诗人不再在道德上战胜他的君主，而是因国王的不肯妥协而死去。

与此同时，随麦克斯威尼之死而来的更大的戏剧早已占据了舞台中央。与大英帝国对抗了几个世纪之后，爱尔兰人明白了，在民族主义者死亡一事上最有效的抗议是一场声势浩大、万众瞩目的葬礼。葬礼在爱尔兰依然是重要的公众活动。对于像麦克斯威尼这样的自由战士，罗马天主教会葬礼再一次激发了爱尔兰普通民众的坚定信仰，正是这一信仰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大饥荒这类灾难中支撑了他们：大饥荒也被麦克斯威尼自己的绝食决定唤起，麦克斯威尼将绝食视为留给他反抗他眼中的英国压迫者的唯一武器。尽管英国当局努力把他的死亡描绘成一种自杀，麦克斯威尼自己清楚他正扮演着一个准备为事业献身的战士——把世界的注意力引向爱尔兰自由事业这一战役的一部分。身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这样做时或许相信基督教所许诺的：他的灵魂不会死亡，而会不朽。

考虑到所有这些象征层面的共鸣，英国当局害怕麦克斯威尼的葬礼引发民众骚乱也是有道理的。但是面对罗马天主教的权威，尤其是咄咄逼人的伦敦南华克区主教，英国机构让步了。由此也就有了随后的南华克区大教堂仪式繁复的葬礼——爱尔兰艺术家（受封英国贵族）约翰·莱弗里爵士的一幅画实际上就纪念此事。尽管在都柏林，

由于害怕政治骚乱，葬礼（而非游行）被禁止，麦克斯威尼的家乡科克举行了第二场，甚至更大规模的教会活动。媒体称这件事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甚至拍成了电影。电影片段今天依然可以在 YouTube 上找到。¹⁵

正如麦克斯威尼漫长的绝食新闻通过电报被郭沫若知晓，现在电报同样扮演着主要角色，将他的死亡和两场葬礼的消息传递到世界各媒体平台。媒体的详细报道——以及葬礼每个仪式的生动照片——从平躺的麦克斯威尼尸身到送葬行列，走过伦敦、都柏林，最后抵达科克，以及随后的落葬——在长长的系列新闻报道中达到高潮。麦克斯威尼走向死亡的 74 天中，他的绝食早就在欧洲（尤其在巴黎和罗马）聚焦了持续不断的媒体关注，有时每天都有。在他卧床垂危的时候，英国报纸开始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他的死讯一宣布，纽约商会的成员就拒绝卸载英国货轮。据报道，抗议活动在印度、巴西和西班牙（那里的加泰罗尼亚公会举行了同情罢工）爆发。媒体在将麦克斯威尼之死戏剧化中所起的作用，可以从一份意大利报纸的新闻标题中看出来，它用大号黑体写道：“麦克斯威尼的痛苦挣扎……爱尔兰共和国万岁！”不过还是《纽约时报》在描述麦克斯威尼走向死亡的绝食时找到了恰如其分的比喻：“具有深刻悲剧性的行动在舞台呈现，全人类都在观看”。

从结果来看，特伦斯·麦克斯威尼之死远远超越了过眼云烟般的小报噱头。在英国，在绝食示威快结束的时候，国王乔治五世在电报中对首相劳埃·乔治说：“如果让他死在狱中，后果不堪设想。国王已准备好赦免，如果你能接收这个建议，相信这是明智之举的话。”尽管这个“明智之举”未被采用，麦克斯威尼的绝食示威甚至在英国国内也赢得了众多自由主义者的同情，《每日电讯》在他辞世当天（1920 年 10 月 26 日）评论说，“市长大人为他衷心相信的事业而献身，每个有着正常本能的人想到这一行为都不能不动容。”不过尽管对他的行为表示了同情，这一行为依然被斥为“试图通过伤害对手的情感来加以胁迫的不正当手段”。

这样的心理柔道给很多当权者造成了类似的思想分裂。然而在麦克斯威尼死亡的那几个星期，关于爱尔兰自由政府与英政府和平共处的第一次试探性讨论在伦敦的外交部举行。在中国，几乎就像平行宇宙一样，郭沫若关于麦克斯威尼的激动人心的诗歌《胜利的死》激发了五四运动中的青年新的政治动力。影响进一步扩大，在海外中国人中，据说它帮助了那些尝试建立现代化新中国的人建立起一个新的想象共同体：他们中包括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巴黎的留学生——以及许多在日本学习的中国知识

分子，郭沫若的战友。事实上，《胜利的死》一诗所做的，在《女神》这一更大的语境中，是证实了“全球性的”革命热情——不仅是民族主义的，而且是跨越民族的——成了一种精神生命的力量。

在这样做的时候，《胜利的死》也创造了一种新的革命型诗歌，采用一种既自我授权又自我否认的修辞。通过诗句，诗人将自己塑造为一个传播慷慨激昂的公众声音的喉舌，努力改变它的世界。麦克斯威尼自己做出叙述的时候，也试图变成爱尔兰独立事业的喉舌。在其死亡的激励下，伦敦的一位年轻人胡志明，未来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据说曾高呼：“一个拥有这样公民的国家永远不会屈服。”麦克斯威尼辞世一年后，他的《自由法则》一书出版，并被翻译成多种印度语言，据说对圣雄甘地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1年印度反殖民主义者巴哈哥特·西恩面对自己的死刑时，引用麦克斯威尼的话说，“我相信我的死亡会比我被释放更能摧毁英帝国。”

在爱尔兰，直到最近，在爱尔兰共和军抵抗英国在北爱的统治的政治斗争中，绝食抗议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最近的例子是鲍比·桑兹与梅兹/长凯什监狱的其他9位犯人的饿死，他们在1981年绝食而亡）。但是没有人像特伦斯·麦克斯威尼一样赢得了世界舞台。不仅今天爱尔兰的那些老人们明白他的死亡的重要性，年轻人对他的记忆也在宣传下保持鲜活，比如地方盖尔语协会运动场上的壁画——或者那幅巴勒斯坦青年的头像的画，写着他的语句：“赢得胜利的将不是那些最能出击的人，而是那些最能受苦的人。”这些话提醒着我们，特伦斯·麦克斯威尼并不是仅仅为爱尔兰的自由，甚至不是为了更普遍的政治自由而献身——而是为了他看到的被压迫人民的精神自由——在所有地方、为了他的时代——以及我们的自由。

《胜利的死》

作者：郭沫若

爱尔兰独立军领袖，新芬党员马克斯威尼，自八月中旬为英政府所逮捕以来，幽囚于剥里克士通监狱中，耻不食英粟者七十有三日，终以一千九百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死于狱。

其一

Oh! Once again to Freedom's cause return,
The patriot Tell – the Bruce of Bannockburn!

爱国者兑尔 – 邦诺克白村的布鲁士①，

哦，请为自由之故而再生！

– – Thomas Campbell

哦哦！这是张“眼泪之海”的写真呀！

森严阴耸的大厦 – 可是监狱的门前？可是礼拜堂的外面？

一群不可数尽的儿童正在跪着祈祷呀！

“爱尔兰独立军的领袖马克司威尼，

投在英格兰，剥里克士通监狱中已经五十余日了，

入狱以来耻不食英粟；

爱尔兰的儿童 – 跪在大厦前面的儿童

感谢他爱国的至诚，

正在为他请求加护，祈祷。”

可敬的马克司威尼呀！

可爱的爱尔兰的儿童呀！

自由之神终会要加护你们，

因为你们能自相加护，

因为你们是自由神的化身故！

10月13日

其二

Hope, for a season, bade the world farewell,
And Freedom shrieked – as Kosciuszko fell!

希望，暂时向世界告别了，
自由也发出惊叫——当珂斯修士哥死了！

—— Thomas Campbell

爱尔兰的志士！马克司威尼！

今天是十月二十二日了！（我壁上的日历永不曾引我如此注意）

你囚在剥里克士通监狱中可还活着在吗？

十月十七日伦敦发来的电信

说你断食以来已经六十六日了，

然而容态依然良好；

说你十七日的午后还和你的亲人对谈了须臾，

然而你的神采比从前更加光辉；

说你身体虽日渐衰颓，

然而今天是十月二十二日了！

爱尔兰的志士！马克司威尼呀！

此时此刻的有机物汇当中可还有你的生命存在吗？

十月十七日你的故乡——可尔克市——发来的电信

说是你的同志新芬党员之一人，匪持谢乐德，
因在可尔克市监狱中断食以来已六十有八日，
终以十七日之黄昏溘然长逝了。

——啊！有史以来罕曾有的哀烈的惨死呀！
爱尔兰的首阳山！爱尔兰的伯夷，叔齐哟！
我怕读得今日以后再来的电信了！

10月22日

其三

Oh! sacred Truth! thy triumph ceased a while,
And Hope,thy sister,ceased with thee to smile.
哦，神圣的真理！你的胜利暂停了一忽，
你的姊妹，希望，也同你一道停止了微笑。

—— Thomas Campbell

十月二十一日伦敦发来的电信又到了！
说是马克司威尼已经昏死了去三回了！
说是他的妹子向他的友人打了个电报：
望可尔克的市民早为她的哥哥祈祷，
祈祷他早一刻死亡，少一刻痛伤！
不忍卒读的伤心人语哟！读了这句话的人有不流眼泪的吗？
猛兽一样的杀人政府哟！你总要在世界史中添出一个永远不能磨灭的污点！
冷酷如铁的英人们呀！你们的血管之中早没有拜伦、康沫儿的血液循环了吗？

你暗淡无光的月轮哟！我希望我们这阴莽莽的地球，
就在这一刹那间，早早同你一样冰化！

10月24日

其四

Truth shall restore the light by Nature given,
And, like Prometheus, bring the fire of Heaven!

真理，你将恢复自然所给予的光，
如像普罗美修士带来天火一样！

— — Thomas Campbell

汪洋的大海正在唱着他悲壮的哀歌，
穹窿无际的青天已经哭红了他的脸面，
远远的西方，太阳沉没了！——

悲壮的死哟！金光灿烂的死哟！凯旋同等的死哟！
胜利的死哟！

兼爱无私的死神！我感谢你哟！你把我敬爱无暨的马克司威尼早早救了！
自由的战士，马克司威尼，你表示出我们人类意志的权威如此伟大！

我感谢你呀！赞美你呀！“自由”从此不死了！

夜幕闭了后的月轮哟！何等光明呀！……

10月27日

参考文献

- ¹ Chen Li (2019), 'An Emerging Field: Irish Studies in China,' *Ireland/China: Translocations, Transformations*, Dublin: New Island. 相关段落引自陈丽即将在《爱尔兰》上发表的文章。
- ² 郭沫若在这一新现代性中所起的作用, 参见 Pu Wang (2018), *The Translatability of Revolution: Guo Moruo and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ul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本文受到该书的启发。
- ³ Chen Li (2019).
- ⁴ Jerusha McCormack (2013), 'Irish Studies in China: The Widening Gyre,' *Studi Irlandesi*, no. 3, pp. 157–80.
- ⁵ Wang, p. 55.
- ⁶ 关于郭沫若的“语言上的激进主义”, 见 Johannes Daniel Kaminski, 'Punctuation, Exclamation and Tears: *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in Japanese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1889–1922),' *Comparative Critical Studies*, vol. 14 no. 1, pp. 29–48 (accessed online May 2017). 在这篇文章中, 卡明斯基称“那时西方标点符号几乎未被介绍。”
- ⁷ Liu Rongqian (2002), 'Whitman's Soul in China: Guo Moruo's poetry i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in *Whitman East and West*, ed. Ed Folsom,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 ⁸ 王锦厚、秦川、唐明中、萧斌如选编, 《百家论郭沫若》, 成都: 成都出版社, 1992 年, 第 50-51 页。转引自 Liu (2002), p. 183.
- ⁹ 同上, 第 184 页。
- ¹⁰ 'Guo Moru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Review of *The Phenomenology of "Zeitgeist"*: *Guo Moru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y Pu Wang' (28 May 2015) from <http://dissertationreviews.org/east-south-and-southeast-asia/chinese-literature> (accessed 25 January 2018).
- ¹¹ 引自叶芝后期诗歌《人与回声》(1938)。
- ¹² 引自他在 1920 年 3 月 20 日就任科克市长时的就职演说, 作为附录收在 Máire MacSwiney Brugha (2005), *History's Daughter: A Memoir from the Only Child of Terence MacSwiney*, Dublin: O'Brien Press.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的《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1983) 中, 对建立民族国家、签订社会契约时有必要做出流血牺牲有一些有力的论断。
- ¹³ Toirdhealbhadh Mac Suibhne [Terence MacSwiney] (1918). 'Appendix II', *The Ethics of Revolt. A discussion from a Catholic point of view as to when it becomes lawful to rise in revolt against the Civil Power*. Reprinted from *Irish Freedom*. Cork, p. 24.
- ¹⁴ Anthony Bradley (2009), 'Nation, Pedagogy, and Performance: W. B. Yeats's *The King's Threshold* and the Irish Hunger Strikes,' *Literature and History*, vol. 18, no. 2, p.26 from <http://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72.3?journalCode=laha> (accessed 15 January 2018).

¹⁵ 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U16rhRHP7M>.